

· 教育与教育思想史 ·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及其影响

张学强, 胡 君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中国现代大学的边疆服务肇始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与近代以来中国基督教传播路径的转向、大学的现代转型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建国宗旨的倡导密切相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边疆服务活动以边疆服务、研究与训练的一体化为指导思想, 既体现了参与各方共同服务于抗战建国方针的民族主义倾向, 又包含了各自差别化的利益诉求; 服务活动的开展既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 大学; 边疆服务部; 边疆服务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5)05-0086-08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Border Service of Universities in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ZHANG Xue-qiang, HU Jun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Minoriti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Border servic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began in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related to the turning of the propagation path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university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especial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urpose of Anti-Japanese and Constructing the Country. Border service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service, research and training, not only reflected the common trend of nationalism, but also included different interests appeals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service activities. The border servic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exerted positive social effects, also had a certain limitation.

Key words: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university; border service department; border service

收稿日期: 2015-03-16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2-0621)

作者简介: 张学强(1971—), 男, 甘肃会宁人,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民族教育史研究; 胡 君(1983—), 女, 甘肃兰州人,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事教育史研究。

中国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在清末民初已现端倪,并在其后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教会大学特别是基督教大学做得更为出色,但面向边疆地区社会服务活动的开展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十余年后才开始出现。整体上看,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服务活动持续的时间不长,既缺乏各级政府及教育管理部门的制度性安排与设计,又缺少众多大学的普遍性的、持续性的自觉参与,对此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直到近些年来才有少数学者在论及边疆服务运动时涉及此问题;另一方面,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服务活动的研究又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活动的开展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它顺应了当时抗战建国的国家战略需求,体现了基督教在华传播路径从个人福音向社会福音倾向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大学办学功能的现代转型,也是在新的边疆工作的理念下将边疆服务、研究与训练一体化的结果。大学的边疆服务是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民间基督教团体、大学及边疆社会等各方共同参与的活动,活动的开展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甚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响应,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倡导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当下而言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情境化理解:解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服务的多元视角

从表面上来看,探讨大学的边疆服务涉及“大学”与“边疆社会”两个方面,但如果将其放置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我们便会看到,大学的边疆社会服务实质上折射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特别是全面抗战阶段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基督教会团体、大学及边疆社会等诸多要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从多元的视角及关系的复杂性方面看待此时的大学边疆服务问题,可以使我們获得对此问题更趋真实的情境化理解。

1. 从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治理与边疆建设的视角来看大学的边疆服务

与之前的北洋军阀统治相比,南京国民政府对边疆治理与边疆建设的态度更趋积极,1929年成立蒙藏委员会专门处理蒙藏边疆事务,并号召有志青年和社会团体积极服务边疆、开发边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倡,“只要我全国的青年立定志向,任他人所不敢任的工作,受他人所不能受的痛苦,乃至冒险犯难,进到常人之所不敢到的边疆僻

壤,以适应国家社会的需要,而充实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此国家社会的改造,亦必易如反掌”^[1]。

总体上看,南京国民政府及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对于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持积极支持态度。1943年10月,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并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担任边疆服务委员会名誉主任的孔祥熙在边疆服务委员会第五届年会上致辞称:“中华基督教会是中国基督教的教会。边疆服务部是基督教的服务运动。其目的在以宗教的精神和服务的事业促进国民的团结,是一个宗教的爱国运动。”^[2]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以下简称“边部”)是组织开展边疆服务(包括大学边疆服务)的主要力量,孔祥熙对边疆服务部的支持既体现了一个开明基督教徒的积极态度,实际上也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一贯的基本立场。

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抗战开始后大学的各种社会服务活动也持积极态度。193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目的在于促进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级学校更好地开展社会服务。大学的边疆服务作为大学社会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及地方行政机关的支持。在抗战期间,各级政府除了与大学合作开展有关边疆建设的项目研究外,对于大学边疆服务的一些活动如暑期大学边疆服务团的活动也积极支持。1940年4月25日,边部就组织第一次暑期大学生边疆服务团活动曾发给四川省政府一份公函,请求四川省政府在服务活动经费及当地行政机关的协助等方面予以帮助和协调,四川省政府即责成教育厅及民政厅办理相关事宜,使得第一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活动得以顺利进行。教育部为顺利推进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工作,特别制定了《教育部主办公私立大学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服务细则》,规定服务团“以推进边疆文化联络边胞感情,并使学术与实际工作相互印证,俾抗战建国大业能迅速完成为目的”^[3],1941年第二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便由教育部与边部共同举办,教育部安排王文萱担任团长并主持服务团工作。

2. 从基督教会在华传教事业展开角度来看大学的边疆服务

20世纪上半叶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重要转型期,在19世纪中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广泛兴起的“社会福音”神学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影响下,基于对中国基督教传教事业面临的困局及挑战的反思,在华基督教会传教事业开始了其民族主义取向的“本色化”发展路径,最终由中华基督教全国

总会及其所属的边部在抗战建国的背景下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发起了边疆服务运动,它“是一场以中国基督徒为主体,以服务中国边民为目的的福音传播及社会改造运动”^[4]。在《边疆服务部致各地同道公函》中,边部对边疆服务运动的目的进行了明确的表述:“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博爱,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动了一个向来不被人注意的工作,到边疆去,去服务那些一般人认为是野蛮的苗瑶番羌戎僰倮各部的民众。”^[5]在《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工作计划大纲》中也称“以基督服务精神,本中央抚幸边民之德意,对边疆民众从事各种服务,藉以启发边民知识,救济边民疾苦,改善边民生活,促进边民团结,充实国家能力”^[6]。

对于基督教会而言,大学特别是与其血脉相通的基督教大学是其推进边疆服务运动的宝贵资源,大学师生在边疆地区社会服务与改造的诸多领域中都会大有作为,如边地农业病虫害的调查与防治、边民疾病的预防与诊治、边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等,也是其向边疆社会宣传基督福音的重要力量,因此边部便积极与各大学开展合作,将边疆研究与服务结合起来,并多次组织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开展边疆服务。

3. 从中国大学的现代转型来看大学的边疆服务

对于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中国本土大学与教会大学来说,对大学社会服务工作的强调体现了当时大学的办学理念的深化,即通过社会服务等实践活动服务于大学的人才培养,同时美国大学重视社会服务与推广的理念对当时中国大学办学理念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大学社会服务的开展契合当时蓬勃开展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潮流,顺应政府推进大学与社会融合的政策导向,而全面抗战开始后大学的内迁及时局的变化尽管使大学的社会服务活动受到很大影响,但又为大学的社会服务提供了新的机遇,社会服务在经历了从面向城郊社区到农村地区的转变后又进一步向边疆地区渗透。^①

由于本土大学与教会大学各自的文化传统有差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社会服务的开展方面便有各自不同的需求与考量。中国本土大学从其产生之初起就承担着解救民族危难的重任,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阶层“经世致用”的精神血脉,大学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而五四运动前后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传播也为大学推行社会服务提供了理论基础,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又对大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迫切要求。至国族危难,抗战军兴,大

学为社会特别是为边疆社会服务的使命感进一步凸显;而对于中国教会大学来说,受 19 世纪末期西方来华传教士社会福音思潮、20 世纪初在美国等国兴起的“平信徒传教运动”及日渐强势的美国基督势力强调现实性及社会使命感等多方面的影响,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从弘扬基督教教义中的牺牲及服务精神出发,鼓励大学师生积极从事社会服务活动,而本土大学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对教会大学办学方向的质疑、非基督教运动及收回教育权运动等带来的压力也迫使教会大学调整办学方向,将为社会服务尤其是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服务、推进中国广大农村生活的重建作为自身的办学特色,而边疆服务无疑将教会大学转向中的世俗性、民族主义、牺牲与服务精神推向了极致。

从整体上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的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是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多种力量共同促成的结果,既体现了教会、政府、大学等多元参与者积极维护国家利益、有效促进边疆社会发展的共同愿景,也包含了对各自需要的合理考量。它是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转型的重要表现,是中国基督教团体国家意识、创新思维、服务品质与牺牲精神的集中表现;它是国家抗战建国战略下边疆治理政策的具体实践,契合了边疆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它是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本土大学转型的必然选择。

二、服务、研究与训练的一体化： 大学开展边疆服务的基本思路

1. 边疆服务、研究与训练一体化思路的提出

边疆服务是在全新的边疆社会工作的范畴下展开的。时任华西协和大社会学系主任并亲自参与指导边疆服务活动的李安宅首先提出了边疆社会工作的理念,他认为,传统的治边策略的主要问题在于“歧视边民,成见太深,未将边民看作国民”,“忽视边民生计,不论重威、重德,或德威并重、军政参用,以及利用羁縻、教导诸法,均未改善边民生计,因而边民生活形态迟迟不进,文化水准至今还带原始色彩”^[7]。他明确主张,边疆的工作应是一种社会工作,以“现在的势与时,正宜引用公民原则,与夫区域分工的生产制度,而以社会工作的方法进行福利建设的事业”^[8]。在李安宅看来,边疆服务、研究与训练三者当合而为一,“使研究为了服务,使服务得到研究的资助(服务才不是盲目的),即以资助研究(研

究才不是抽象的),且使同工即在研究与服务中得到训练(训练才不是形式的)”^[9]。这种训练不仅是对作为外来服务者的训练,也包括通过对边民的训练使其成为本土的服务者,“我们服务的最终目的是使我们的服务对象再不需要我们前去服务,所以最好是随时找代替我们的服务者,尤其是要训练边胞们自己能出而代之”^[10]。

李安宅是边疆社会工作理念的倡导者和社会工作方法的设计者,也是边疆社会服务的主要指导者,他将研究、训练及服务相结合的边疆社会工作思路得到了边疆服务的核心组织者边部的认同,并在包括大学边疆服务在内的整个边疆服务活动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实施。曾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后专任边部主任的张伯怀在谈到边疆服务与研究时也认为,研究固然为了更好地服务,而研究也必须以服务为基础方可进行:“学术专家调查与研究,……凭着一两天或十天半月的居留,彼此毫无认识与信任,而希望得其真情实况当然是不可能的了。内地的乡村如是,边疆之社会更困难得多了。所以要望对于边疆的研究真实可靠,非以服务为其基础不可。”^[1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服务活动的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治边理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突破了传统治边策略的窠臼,呈现出从传统边疆治理向现代边疆建设转换的新的治边思路。在边疆服务活动中,尽管有不同层次政府力量的介入,但本质上它是由社会力量与学术团体共同组织、发起的运动,因此便能比较彻底地摆脱传统自上而下固化的行政化模式,消除专制懈怠的官僚习气,体现出服务者与边民融为一体的平等意识与积极主动、追求实效的服务精神,体现出服务者的兴趣、理性与责任意识,而基督教所倡导的牺牲、奉献精神更使得服务活动呈现出一种纯粹的利他主义风格,也使得服务、研究与训练一体化的思路在边疆服务活动中得到较好地体现。

2. 大学与边部合作计划中边疆服务、研究与训练的一体化

大学既是边疆社会的服务者,也是边疆问题的研究者,更是边疆工作人员的训练者^②,作为边疆服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的边疆服务活动也体现了服务、研究与训练一体化的特点。大学边疆服务活动大都通过与边部的合作方式展开,许多大学如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等都有过与边部的合作计划,在这些合作计划中明确体现了将服务、研究与训练及一体化的思路。如1940年齐鲁大

学医学院与边部曾有过一个合作计划,在该计划中明确提出,齐鲁大学医学院辅助边部完成卫生设置,第一年在川康各设中心保健院或医疗院一处,第二年在每区添设分院两处,第三年除了在每区添设分院两处外,再添设保健院若干,设施由双方负责,经费由边部筹措,院长则由双方商选。除此之外,每年暑期由齐鲁大学医学院选择高年级学生组织医疗卫生队,由教授带队到川康两区作开荒式卫生教育及医疗工作。另外,对于地方疾病的调查与研究,由边部商请医学院选派专家前往办理,这些专家从事研究时得商请边部协助搜集标本资料,同时每年双方合作开设卫生训练班,选取优秀分子予以训练。^[12]尽管这一计划由于多种原因并未完全实施,但服务、研究与训练一体化的思路仍然有着明晰的体现。

3. 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活动中边疆服务、研究与训练的一体化

从1940年开始的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活动在立足服务本位的同时,也非常强调研究与训练,在每次的服务活动中,也承担多项调查研究的任务,并注重服务前与服务中的各种训练。在川西及西康等地连续开展五年的大学生暑期服务活动中,参与服务的学生在嘉戎语言研究、土司制度研究、羌族宗教与文化研究、嘉戎村落研究、杂谷脑喇嘛寺院研究、边疆土地利用研究、保保族语言研究及边疆医学等方面取得了成果。^[13]同时,在开展边疆服务之前,注重对服务人员之训练,在服务过程中亦重视对边民及边地教师等群体在知识、技能与观念等方面的训练,以期达到开通民智、提升生产技能及强化国家意识的目标。^③

三、多途并举与全面介入:大学边疆服务活动的形式及内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开展的边疆服务活动通过多种途径展开:有的由大学与边部合作开展研究性服务活动,这些研究性服务活动不仅有其学术价值,更带有直接的社会服务的特点;有的由边部、教育部、教育厅等机构和大学等发起的大学生暑期(和寒假)边疆服务活动;除此之外,一些大学学者也参与了边疆服务活动的组织及指导工作,一些大学还开设了边疆语文补习学校等,通过训练以增强大专以上毕业生服务边疆社会之技能。这些服务活动涉及边民生产生活的诸多重要领域,如边地流行疾病的预防和控制、边地农业及畜牧业病虫害防治、成年

边民扫盲、边地小学生教育及小学教师培训、边民生产技能培训等,不仅关注边民身体素质之改善与相关技能之训练,也重视边民现代知识之掌握及服务于抗战建国目标的公民观念之养成,因此整体上看,大学的边疆服务体现了多途并举与全面介入的特点。

1. 大学教授研究性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

在大学的边疆研究中,服务型的边疆研究虽然不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一些研究计划由于多种原因未能真正实施,但它却最能体现边疆研究经世致用的特点,尤其是在边疆地区流行病及畜牧业、地方资源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等涉及边民“生计”方面的调查研究最能体现研究与服务相结合的特点。由于这些调查研究将研究与服务合为一体,研究以服务为目标,在研究中展开服务,因而可将其视为研究性服务活动,它们大都通过与边部的合作形式展开。

川康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很差,黑热病、回归热、甲状腺肿大及肠寄生虫等多种地方性疾病流行,边部联合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等八所大学对这些疾病的传播范围及危害程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防治这些地方性疾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边部除了在1940年联合齐鲁大学医学院组成暑期服务团在西康进行医疗服务及调查研究外,1943年暑期又邀请主持齐鲁大学病理系20余载的知名学者侯宝璋前往川西协助边部卫生人员调查边民食道疾病,调查结果发现,佳山寨男女老少都患有蛔虫病,根据检查结果由边部加以普遍诊治。^[14]同年,边部又邀请侯宝璋对儿童所患死亡率极高的所谓“恶浊”病进行病理研究,指导边部卫生人员对患病儿童进行了详细检查,确诊“恶浊”病即“黑热病”,大大鼓舞了边部卫生工作人员的服务士气。^[15]1944年7月底,侯宝璋等人再次前往川西区,会同边部卫生工作人员研究黑热病等的分布情况,后根据对川西汶川、茂县及理番一带的疾病调查,撰文对川西汶川、理番一带常见的疾病如肠寄生虫病、回归热、黑热病、泻肚和痢疾及营养不良的分布、症状及危害等进行了具体介绍。^[16]

根据边部各医疗单位的工作记录及历届学生暑期服务团的调查报告,川西松、理、茂、汶一带眼疾非常普遍,边部与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联合医院眼科教授陈耀真商议组成眼疾医疗队,进行治疗及作调查研究,主要区域为“沿杂谷河的威州、理番、杂谷脑三处,及其附近住民,其它如映秀湾,汶川塘上通化等地,皆有求治者”^[17]。

在边疆地区畜牧业、矿产资源及农作物病虫害

防治等方面,边部与大学也合作开展了一些调查研究^①,其中以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刘国土对川西区麦病的调查最为细致,影响也最大。刘国土主导的川西小麦病虫害调查与防治工作不仅取得了突出效果,也获得了边胞的信任,为川西麦病防治奠定了坚实基础。1949年,边部又与华西协和大学农业研究所商定在麦病防治上进行合作,由华西协和大学负责川西区的小麦防治。^[18]

2. 大学生暑期(寒假)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

大学生暑期(寒假)边疆服务活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边部和教育部发起的暑期服务活动,另一类是由其他机构或少数大学自行发起的暑期(及寒假)边疆服务活动。

(1)边部和教育部发起的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活动。

学生暑期服务团最初于1938年夏季由成都的五所基督教大学学生团契所组织。边疆服务运动开展后,鉴于边部服务人力有限,无法满足边疆服务的需要,边部在教育部及四川省政府的支持下,联络当时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及中央大学等院校的基督徒学生团契及四川基督教青年会,于1940年在成都发起成立“中华基督教会学生暑期服务团”,并规定服务团“以使大学生利用暑期时光从事边疆工作,藉以认识边疆情形,养成服务精神,促进后方建设,改善边民生活”为目的,“以川康边境为服务范围”,“以沿路过往之番化羌民并汉处其间之汉民为对象”,以“各种教育方式进行服务”。^[19]

川西区的暑期服务活动于1940至1945年间展开,除中断一次外,几乎每年都举行。川西区的第一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始于1940年,在四川省政府及教育厅、民政厅的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下,边部协同成都各大学及其他教育机关于当年5月19日在华西协和大学成立“成都基督教学生边疆服务团”,由金陵神学院教授蒋振翼及边部川西区主任崔德润为正副团长,参加者有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及铭贤农学院、华西神学院及华西协和中学等大、中学生80余人,分九队赴茂县、理县、汶川等县羌、戎村寨从事抗战宣传、卫生运动、农业推广及社会调查工作,在边区服务6周后返回成都。1941年7月,教育部又与边部共同举办了大学生暑期服务团前往川西区进行服务活动,教育部委派王文萱担任团长,参加者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大学师生共57人,服务团分为服务队和考察队两组,其中服务

队分三组,分赴佳山寨、理县及杂谷脑从事服务活动。第三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仍由成都基督教各大学师生组成,共35人,由齐鲁大学教授张雪岩任团长,于1942年7月赴川西服务。在此次服务活动中为提高边地小学教师的素质及改进教学方法,边部与理县政府合作举办“小学教师训练班”,将全县70余位小学教师会集于佳山寨小学进行培训,由齐鲁大学社会学教授张雪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理系教授刘恩兰、齐鲁大学医学院教授栾汝珪、华西协和大学植物学教授胡秀英等分任各科讲席。此后,边部又联合一些院校分别举办了第四次及第五次服务活动,帮助边部所办学校改进教学及从事宗教福音宣传等,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西康区的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活动也始于1940年。边部成立不久,即“联合齐大医学院组成的暑期边疆卫生队”,由齐大医学院院长张剑涛、教授张冠英以及边部主任张伯怀带领,至“西康省旧宁属十几个县的边荒区域,做医疗及研究调查工作”^[20],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1941年教育部与边部共同举办的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除了在川西区服务外,亦在西康区组织服务活动,“该团共分两队,一为川西队,以理番县西北之马塘为中心,一为西康队,以越嶲或冕宁为中心,已于七月间出发”^[21]。其后于1944年夏边部又联合西康学生救济会联合举办暑期学生边疆服务活动,从7月中旬至9月初,历时一月半,参加的学生主要为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及西康中学等校学生,服务工作主要包括巡回剧队、巡回卫生队、夷民教育、汉区乡村教育及夏令儿童学校、农村生产及建设辅导、社会调查和乡村布道等。^⑤1944年12月,为“发动成都大学生组织凉山(保区)服务团,深入保区,藉教育、医药的机会,研究保区社会情况,启发边胞国家意识,增强国家抗战力量”^[22],边部主任张伯怀在得到成都各大学及一些国际团体的大力支持后开始组建“凉山抗建服务团”,并于1945年2月底正式成立,由有志服务边疆并有特长的青年学生组成,3月初在华西坝接受相关训练,由各大学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如李安宅、徐益棠、柯象峰、刘恩兰、马长寿、林耀华、冯汉骥、蒋旨昂等为主要训练导师,并于3月下旬在张伯怀带领下经西昌分赴昭觉县属之美姑河、牛牛坝及黄茅埂等地从事服务及调查研究活动,至6月结束,实际上服务时间已超出假期范畴。

(2)由其他机构或大学自行组织的大学生暑期(寒假)边疆服务活动。

除了由边部及教育部举办的大学生暑期边疆服

务活动外,还有其他行政机构和大学也举办了此类活动,如在1940年金陵大学学生除参加边部组织的暑期服务活动外,也参加了由四川省教育厅主办的雷马屏峨边区施教团,施教团聘请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柯象峰及边疆研究问题专家徐益棠担任正副团长,“参加者除省府教育、建设、民政各厅外,本校同学亦多参加。步行两千余里,费时凡一月余。除宣传工作方面,有抗战建国、兵役及优恤出征军人家属、新生活等项外,并沿途映放影片、诊疗疾病。至于民间疾苦及社会经济等情况,亦颇注意及之”^[23]。

1941年暑期,西南及西北各大学边疆系均有学生赴边地从事研究及服务活动,中山大学又特别从毕业生中选拔优秀学生赴康藏及云南等地从事边疆服务和研究活动。^[24]1942年暑期,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的几位热心边疆教育的学生发起成立了边疆教育研究会,在得到昆明学生救济委员会等几个机构的资助后,于当年7月中旬赴云南路南尾则从事边疆教育服务活动,主要参加者为教育系及社会系的十几位学生,服务期限70天。服务活动主要包括编制教材、办理民众学校、巡回施教、供给宣传资料、进行社会和教育调查、收集文献资料、宣传抗战建国主张及沟通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感情等。^[25]1943年寒假,边疆教育研究会又组织十位同学赴云南路南县滥泥箐从事社会教育服务活动,主要进行妇女教育、儿童教育及组织小学教师讲习班等。^[26]

(3)大学中边疆服务人员训练班的筹设。

南京国民政府较为重视边疆建设与服务人才的培养,除在一些高校设立蒙藏回文系及边政系直接培养边疆人才外,一些大学也开设蒙藏回文等选修课目以供将来服务边疆建设者修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学也开始筹设边疆研究班及边疆语文补习学校等,训练有志于服务边疆的大学专科以上毕业生,使其掌握边疆服务之必需技能。如华西协和大大学边疆研究所为开展边疆服务工作考虑,于1943年前后筹设边疆研究班以训练边疆服务人员。^[27]国立中央大学边建学会也于1947年前后筹设边疆语文补习学校,训练专科以上毕业人员,以增加其服务边疆之技能。^[28]

四、大学边疆服务活动的历史意义及局限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服务活动的兴起、

发展及其结束与时局之变化密切相关,由于多方积极参与,且对活动之组织与实施多能仔细筹划、诚心而为,因此产生多种积极影响便在情理之中,但又受时局变化及服务力量等因素制约,服务活动又有明显的局限性。

多方参与的大学边疆服务活动有着藉边疆服务以达成抗战建国目标的基本宗旨,作为整个边疆服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对于提升边民智识与技能、沟通各民族之间情感及形成抗战救国之意识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边疆社会的调查研究及宣传,又使国民对于边疆社会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大学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也体现了一种边疆开发与建设工作的新理念、新思路与新模式,即以新兴的边疆工作理念代替传统的政治治边理念,提倡科学化与组织化,在服务中体现效率与平等,提倡服务与研究、训练的合一,注重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及大学等多方的合作,以取代传统治边中的官僚主义、权威主义与因循守旧,开创了大学服务边疆社会的先河,其意义不可小觑。

大学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对边疆教育、农业、畜牧业、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边民文化素质之提高、观念之改进、生计技能之提升等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大学边疆教育服务活动中,通过改进学校教育并举办社会教育、小学教师训练班及夏令学校等方式,提升了小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师的教学水平,提高了边民的文化素质;通过医疗卫生服务活动的开展,不仅摸清了边地流行病的种类、病因、危害性及分布状况,诊治了大量患病边民,还提高了边民对近代西医和西药的认识,改变了边民不讲卫生和相信巫术的陋习;通过对农作物病虫害的调查与防治,有效地促进了边疆农业生产,提高了边民的农牧知识和技能。

大学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体现了大学师生对边疆开发与建设的关注与重视,也为大学师生将专业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机遇,特别是大学暑期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使“边疆工作运动变得十分活跃”,成为边疆服务运动中富有生机的推进力量,先后参加暑期边疆服务活动的学生有数百人之多,很多参加服务活动的学生逐渐“深具长期在边疆服务的决心”。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也激起了另外一些大学学生服务边疆的兴趣,在服务运动过程中,“西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及东南各省之公私立大学学生中亦时有人来函表示愿到边地长期工作之意志”^⑥。亲自带队指导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活

动的王文萱在论及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活动的意义时认为,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活动为对于大学教育及边疆社会发展均有裨益,服务活动的开展为高等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线路,有利于陶冶学生之品性、培养学生吃苦耐劳之精神及选拔优秀边疆工作人才,通过“纯洁教员学生”良好服务活动的开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边胞对于政府的仇视态度,为中央及地方政府深入边区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29]除此之外,大学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对于基督教在华传播路径的转向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当然,由于时局的动荡及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大学的边疆服务活动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第一,服务的地点主要限于川西的茂县、理县、汶川等县,西康宁属各县以及云南的个别边地,远未覆盖西南边疆,更遑论广大的西北边疆,一些边部与大学计划合作开展的研究和服务项目也未能真正实施;第二,与整体边疆服务运动一样,大学的边疆服务活动也与时局的变化紧密相关,抗战胜利后边疆地位的重新边缘化,直接影响到大学边疆服务运动的开展,实际上大学边疆服务活动在抗战胜利后便无疾而终;第三,大学的边疆服务活动主要为大学师生的自发参与,教育行政部门特别是大学在服务活动的组织与服务计划的实施中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注释:

- ① 在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主办的《边疆服务》杂志中,编者曾就抗战与边疆服务活动兴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敌人残暴行为的恐怖,无情炮火的威胁,使得不少的教会领袖,流亡异乡,远走华西,是逃难的行为,是避灾的心理,但因此看见边胞的需要,感到边疆的挑战,乃在抗战进入艰苦阶段的时候,成立本部,开始对边民的艰苦服务工作。大学教授,大学学生,纷纷深入边疆,参加工作。假设不是由于空前外患的逼迫,有多少人曾想到边疆,想到边疆的人民?边疆服务部又何从发动呢?”参见《不幸与幸》,《边疆服务》第24期第2页(按:《边疆服务》杂志标记为总期数,下同)。
- ② 在李安宅看来,要有效地开展边疆工作,边疆工作人员的训练是至关重要的,此种训练是边疆学校无法完成的,必须藉由相关大学及专家才能实现:“最属合理、最为经济的办法,应为委托靠近边地或于边疆研究较有历史的大学训练边疆工作员的办法。这样,可以范围推广,且使学术行政合而为一,减轻大量靡费。政治训练权在国家,技术训练委诸大学;大学既有事作,国家亦得各种专家的直接利用。”参见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
- ③ 如1943年7月,在大学生边疆服务团前往川西进行服

务活动前,边部在华西协和神学院举行“团员训练班”,通过研究会、进修会等形式对参加服务的人员进行训练,其中研究会的培训内容分为:(1)边疆问题研究,以明了当地情形;(2)工作内容研究,以充实服务材料;(3)远足及骑马之举行,以壮身体;(4)烹调食物之练习,以谋自立;(5)唱歌游戏及戏剧之研究,以利服务;(6)卫生及救护之研究,以增技能等。出发前的进修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检讨工作方案、发展团队生活、促进精神动员及完成团队组织等项内容。参见《川西威州宗教事工续讯》,《公报》1941年第11期第11页。

- ④ 如1945年8月中央大学畜牧兽医学专家陈之长教授在边部川西区主任崔德润的陪同下对川西地区畜牧事业进行考察。参见《本部消息摘要》,《边疆服务》第9期第35页。
- ⑤ 参见《西昌学生暑期服务团工作经过》,《边疆服务》第5期第19—21页。《边疆服务》记载本次服务活动的时间为1944年7月,一些学者(如杨天宏、邓杰等)在相关论著中也采用此说。此处活动时间上存在矛盾,因《边疆服务》第5期标记出版日期为1944年2月,无误(第4期及第6期分别出版于1943年11月及1944年6月),不可能记载有同年7—9月间边疆活动的进展,可能的情况是此次暑期边疆服务活动组织于1943年暑期,但活动时间有待进一步考证。
- ⑥ 由于参与暑期边疆服务的学生多有志于长期服务边疆,在1943年10月召开的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委员会第五届年会上,有一专门针对此问题的提案:“蓉渝两处大学生参加本会暑期服务团者,多数立场愿以服务边胞为终身事业,亟应筹设研究班,选拔大学毕业生予以补充训练,用充基本干部”,会议原则通过并交付相关机构办理。参见张伯怀:《本部的回顾与瞻望》,《边疆服务》第4期,第6页;《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委员会第五届年会会议记录》讨论事项之第8条,《边疆服务》第5期第5页。

参考文献:

- [1] 蒋介石. 中国之命运[M]. 重庆:正中书局,1943:1.
- [2] 边疆服务部委员会第五届年会孔副院长致词[J]. 边疆服务,1944,(5):2.
- [3] 教育部主办公私立大学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服务细则[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教育部档案,卷宗号:五,12395.
- [4] 杨天宏. 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教会边疆服务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34.
- [5] 边疆服务部致各地同道公函[J]. 田家半月报,1939,(23):20.
- [6][19]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人员名册、工作计划、川西区工作报告、暑期服务团筹备经过[Z]. 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民政厅档案,全宗号:民54,目录号1,卷号2.
- [7][8][9] 李安宅. 边疆社会工作[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25,29,63.
- [10] 李安宅. 研究服务训练要连合起来[J]. 边疆服务,1943,(4):9.
- [11] 张伯怀. 漫谈(一):服务运动之重要[J]. 边疆服务,1943,(2):卷首页.
- [12] 边疆服务部二十九年五六月工作报告[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金陵大学档案,全宗号649,案卷号336.
- [13] 转引自杨天宏. 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教会边疆服务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266.
- [14] 本部近讯(调查特种疾病)[J]. 边疆服务,1943,(4):19.
- [15] 马锡山. 黑热病的发现及治疗经过[J]. 边疆服务,1944,(7):12.
- [16] 侯宝璋. 汶川理番一带最常见的几种病症[J]. 边疆服务,1944,(7):4-6.
- [17] 陈耀真,等. 川西北眼疾调查之经过[J]. 边疆服务,1944,(7):10.
- [18] 本部近况[J]. 边疆服务,1950年复刊号.
- [20] 成都大学生暑期服务团徒步出发[J]. 田家半月报,1940,(14):6.
- [21][24] 边疆考察团体出发[J]. 边政公论,1941,(2):90-91.
- [22] 张伯怀. 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三十三年度)[J]. 公报,1945,(1).
- [23] 学生暑期服务[J]. 金陵大学校刊,1940,280.
- [25] 周简文. 西南联大的边疆服务团[J]. 边疆通讯,1943,(4):13.
- [26] 周简文. 西南联大的边疆教育团[J]. 边疆通讯,1943,(8):10.
- [27] 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开班训练专材[J]. 边疆通讯,1943,(3):16.
- [28] 中大边建学会筹办边疆语文补习学校[J]. 边疆通讯,1947,(6):29.
- [29] 王文萱、边理庭. 大学生去年暑期边疆服务之检讨[J]. 教育通讯旬刊,1942,(2):4.

(本文责任编辑 曾甘霖)